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〇〇期 ——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9e)

-
- | | |
|--|---------|
| 【史海钩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风波 | 陈东林 |
| 【文献资料】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
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动乱年代】不应遗忘的六六至六七年之间的反孔运动
——文革反孔运动面面观 | 周泽浩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风波

• 陈东林 •

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对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30多年前几乎家喻户晓，知道有这样一个“老外”拍了这样一部电影。然而看过的观众，至今却寥寥无几。安东尼奥尼也不知道，他的这部影片进入中国后的第一批观众，就有当时全部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据说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两次观看了这部影片。

2004年11月25日到12月5日，由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和北京电影学院策划组织的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引起中国文化界的特别关注。本次影展放映了他的《中国》、《爱情故事》、《奇遇》、《蚀》等7部长片和7部短片，以及2部关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安东尼奥尼的夫人艾丽卡代92岁高龄的丈夫发来了贺信，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挂念，并对他的作品《中国》能在32年后与中国“重逢”表示感谢。信中说：“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他巨大的满足，并想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表达他的感情。他祝愿这部影片能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因此，许多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前来，想揭开这个谜。10元一张的《中国》票价，被炒到200元以上，仍一票难求。

可容纳900人的电影学院放映厅，人满为患，许多观众席地而坐看完了近4个小时的《中国》。

几乎所有的人看完后，仍然没有揭开一个谜——电影《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成为一件轰动的政治和外交事件的？

◇ 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华拍摄影片

安东尼奥尼，1912年9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费拉拉的一个中产家庭，1935年毕业于波伦尼亚大学的经贸专业。他第一次接触戏剧是在朋友办杂志之时。1940年，他拒绝了在费拉拉的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决定去罗马的电影界闯荡，在《电影》杂志做编辑。几个月后，他开始编剧本，一个剧本只有2000里拉，而且不能署名。31岁时，他以度过童年的波河为背景，得以完成第一部短片《波河上的人们》。这是他第一次直接的体验。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曾随意大利著名新现实主义电影导演罗西里尼工作。1948年，他完成了《城区清洁工》，这部短片与另一位导演的短片，一起获得意大利最佳纪录片银带奖。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独立探索。他以摒弃现实的“叙事”，注重性格的刻画以及含义隐晦的隐喻风格而著称，其导演理念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影响极大。他的主要影片有《女朋友们》、《奇遇》、《蚀》、《红色沙漠》、《放大》等，并以此成为意大利著名的电影导演、摄影师兼制片人，世界级电影大师。1995年，在电影诞辰100周年之际，安东尼奥尼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中国人比较多地知道他，是在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以后。1971年5月21日，由意大利外贸部长、众议员马里奥·扎加里率领的第一个意大利政府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当时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双方在会谈中，决定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往来、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鼓励加强两国的往来。

7月20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提出聘请的导演，就是安东尼奥尼。意大利驻华大使福尔科·特拉巴扎与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在北京会谈后，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乎经过考察，给国内写了一份报告，认为：鉴于中、意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考虑到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意大利记者对中国作了客观报道，所以建议“让一些记者来华工作”。后来，安东尼奥尼听说他们曾向周恩来请示了这个建议。

1972年5月6日，经过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代行文化部职责的国务院文化组批准，由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正式向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转交中国的邀请函。安东尼奥尼对此很感兴趣，退掉了正准备接手的另一部影片。在出发前的几个月，他寄给北京一份意向书，对于他的拍摄目的是这样写的：“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按计划，他准备在中国拍摄半年之久，去很多地方。

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亲任领队，率安东尼奥尼摄制组到达中国，受到中国接待小组的欢迎。接待小组成员包括政工干部、电影摄影师等。这个小组在整个拍摄期间都陪同在他们左右。为拍摄计划，安东尼奥尼一行和中方人员整整讨论了3天，最终放弃了在意大利设计的半年计划，按照中方要求，在22天之内的匆匆赶往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河南林县等地拍摄完。

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极左的政治标准被置于一切的首位。一般人还不能自由地与外国人交谈，更不能让他们摄入镜头。虽然尼克松访华以后，对外交流有了一些松动，但是仍然遵循着严格的“不卑不亢”规定。一切都在预先安排好的轨道上运行。所到之处，他们

看到：学校、工厂、幼儿园、公园里，人们井井有条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详细地拍摄了当时在中国被广为宣传的成就——利用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像一部科教片那样精确而机械。

在纪录片《波河上的人们》中，安东尼奥尼对于挣扎在故乡一条名叫波河的河流上的人们，饱含着一种诚挚的同情，展现出来的画面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有着导演本人对它们深深的理解和热切地想要告诉人们的感情。他抱着这样的情绪来拍摄生活在苏州河上的船工，结果却是旅游风光。此外，还有蜿蜒起伏的长城，故宫奇特的城楼，公园里的太极拳，街头武术，苏州园林的古色古香建筑……作为一个“天生的悲情主义者”，安东尼奥尼显然不满意这种刻意的安排，想另辟蹊径。于是，两种文化和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时时发生。

在河南林县的一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路上的一些老百姓行动诡秘，于是他们扛着摄影机追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农村集贸市场。农民们带着自产的一点粮食、家禽和自制的副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是非法的。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小村庄农民，看到一群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扛着没见过的“大炮”乱扫时，立即引起了惊恐和躲避。也有好奇者贴着泥土墙远远站着看，不后退一步，也决不靠前一步，没有一个人走上前来主动说话。当地干部一挥手驱赶，他们就骚动着散开，然后躲在暗处，只露出半张脸偷窥。这与事先安排好让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北京西单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东风市场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

安东尼奥尼在镜头里捕捉到一些“另类”内容：与课堂上非常有序的读书的孩子们不同，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仰起圆圆的小脸东张西望，对于老师的安排感到困惑和桀骜不驯；从胡同里突然冲出，来不及躲避的光脊梁拉车老人，遮挡着脸匆匆离去；在巍峨的古代建筑一角下，露出杂乱贫困的居民大院……安东尼奥尼在解说词里自己曾经得意地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掩盖了我们的摄影机。”禁止拍摄的地方，就“假装停拍”，暗中继续拍摄；而双方商定拍摄的，他们又不感兴趣的地方，“就用未装胶片的摄影机空拍”。这样用摄影机偷偷摸摸地扫射着中国真实社会的手法，引起了中方一些人的愤怒，西方社会左翼也认为是无礼的、中方随行人员虽然进行了干涉，但并不坚决。他们向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反映了情况。彭华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新闻的“猎奇性”、“趣味性”、“自然主义”，并没有要求采取特别措施。

当然，安东尼奥尼总的态度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所知的国家。”他解说道，“我只能看，但无法作深入的解释：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它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温和，用坚韧的创造力在这个常常是相当贫瘠的土地上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1973年1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电影《中国》的放映发布会。安东尼奥尼对新闻界说：“我去了中国，这首先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个在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上都以全新面貌展现自己的国家。”“我的影片不只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电影，而主要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选择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当机立断的决定。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这更是一部电影笔记……在中国，我问了我的陪同：你们发动了革命，并用革命来建设了这个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什么是最能象征业已发生了变化的东西？他们回答道：人。那么，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是西方国家第一次被批准进入“文革”中的神秘中国摄制纪录片，又是著名导演执导，电影《中国》在西方放映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舆论界立即分为两派：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美国广播公司花了25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当时，欧洲刚刚结束一场受中国“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的风暴。在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学生运动”中，先是反传统、反秩序的学生，后来是工人走上街头巷尾，模仿中国的造反有理，与政府进行街垒斗争。知识分子中，也存在一种崇拜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思潮。著名的哲学家萨特等也参与其中。因为安东尼奥尼只是用他的亲眼所见来解释中国，让那些不了解中国、但期待在影片《中国》中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评价的人十分失望。一个非常有名的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弗朗科·福拉迪尼在评价这部影片时写道：“导演的局限帮助他记录了人的一面。一个毫无本质的世界，面向昙花一现的东西、外表的和生存的困窘：这就是他的哲学，没人会把这种哲学当真。”

电影《中国》在意大利的影响似乎过去了，风潮的中心却转移到了中国。

◇ 两封来信引起江青等人的注意

1973年11月10日的下午，一架美国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走下舷梯，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和前五次相比，这次并没有引起外界更大的关注，因为，中美两国已经在5月互设了联络处，结束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暗中交往，11月14日上午，行色匆匆的基辛格登上飞机，离开北京。4天里，他会见了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没有产生什么震惊中外的新闻，然而，基辛格走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令美国人大惑不解，许多中国人至今也不明内情的事件——11月下旬至12月初，毛泽东听了两个翻译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犯了错误，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四人帮”乘机对周、叶进行大肆攻击。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范围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周恩来被迫进行了违心的检查。

毛泽东了解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12月9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后，曾分三批先后同王洪文、周恩来和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毛泽东还握着周恩来的手，指着王海容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已，也整了我。”于是，“帮周”会议宣告结束。但是，江青等人并不甘心，仍然在捕捉着其他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的一名干部，就电影《中国》问题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了封信，姚文元立即批示：“转中组部业务组调查后写一报告。”17日，这名干部又在第二封信中说：意所谓《中国》长片，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观点上，极恶毒地诬蔑我国的反动影片，整个影片通篇把我国描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常气愤。此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为此，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这一坏影片为世界上帝国主义和右派反华提供了宣传依据资料，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抹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我们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还出现了这样一件严重的问题，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但也绝非偶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认识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线索。

姚文元如获至宝，立即批示：“建议文化组调看影片，并会同中组部彻查此事，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江青仍不满足，更加上纲地批示要求：“应严肃认真对待，并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他们还别有用心地在来信中提到的“摄影组是外交部和广播局合签批准来中国的”和“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这两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上道道。

1974年元旦前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谢静宜等人在钓鱼台17号楼看了电影《中国》，江青一边看一边骂：“中国人里也有汉奸，只有汉奸才让外国人拍这种片子！”她还当场质问：“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谁？驻意大利大使是谁？”有人回答是彭华和沈平。她叫嚷道：“我看把汉奸这顶帽子送给他们两个戴上吧！我看对他们很合适！”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在钓鱼台谋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他负责的外事工作。江青阴险地说：“这几年放进来这么多坏人、特务、间谍，太危险了！当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出了投降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又故作不知地说：“过去我不知道，杨振宁对总理说过此片很坏。最后，广播局XX同志给我和文元同志来信揭发这个影片很坏，我们才抓。”他们决定从追查谁批准的入手，把火引向周恩来。在江青的要求下，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于12月30日晚上调看了《中国》。江青说：“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中央政治局成员看完电影时，已经是31日凌晨1点多，姚文元还打电话指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核心小组：“今天政治局同志看了《中国》电视片，非常愤慨，简直不能看下去，这完全是有意地丑化中国人民，丑化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反共反华卖国的电视片。……这个电视片没有你们陪同人员做后台，不可能拍出来……要认真对待，给中央写报告，不要写给我。这个摄影组是怎么来的，谁请来的……要写清楚。中央派人调查，那是中央的事，你们要向中央写报告。陪同人员是谁？为什么你们报告不点名？你们核心小组要认真对待！”

◇ 污水泼向周恩来

1974年1月9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审查电影《年轻的一代》时，江青又借题发挥，对国务院文化组说：“你们给意大利人搞的那个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请来的。你们要看，组织他们把外交部的人找来看。”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附和说：“河南林县那些镜头是怎么拍的，你们要注意防止外来的细菌。”

1月16日凌晨，江青又指令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看影片《中国》。她说：“难道这不是卖国？”“驻意大利使馆赞扬野鬼！他还不觉得有什么责任，这个大使要撤！”“不配当使节！不能当代表！出中国人的丑！”“戴汉奸的帽子是戴定了！”“一定要有纪律处分，大使要召回，具体负责的要撤职，记者也要调回！”

1月25日，江青擅自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临时得到消息的周恩来匆匆赶来主持。迟群当着周恩来的面在大会上指责说：他们尽拍了一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7月中旬，当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开帽子店的做法时，江青又扯上电影《中国》说：“帽子店，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我一定特别注意，主席放心。”

此时的周恩来，正处在他后来向邓颖超所说的最困难的两个关头（另一件事是“文革”前期，江青利用红卫兵制造的“伍豪事件”风波）。已经发现患有膀胱癌的周恩来，每天晚上要忍着剧痛接受江青等人操纵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轮番批评，回去要写检查。白天还要打起精神，

领导国务院日常工作，进行繁忙的外事活动。一个多月里，他苍老了许多。他尽自己所能，对此事作出了解释。

事情的真相是，1973年5月17日夜里，周恩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杨振宁曾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接着是一个木偶戏的场面，当然这两个场面都拍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小孩都变成了木偶。因我自己没有看过，不知道具体是怎样。

显然，杨振宁只是将此事当作一种动向和信息关心地报告给周恩来，他自己一再说没有看过《中国》，不知道具体是怎样，只是听比较左倾的小报说不好。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周恩来深知，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世界，各种思潮都在涌现，出现一些争论，并不奇怪。而且，他也确实不认识安东尼奥尼，不知道他来华后的情况。因此，他要到场参加会见的工作人员查查。此事就过去了。然而，在场的记录人员不是熟手，对周恩来的这些吩咐并没有记录下来，给他后来带来了说不清的麻烦。

1973年11月，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等人看了该片，在向外交部领导的报告中说，这是近几年来，外国人在我国拍的片子中“最差的一部”，但也说“没有恶毒反华的内容”，不再“正式提出交涉”，只是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向意大利方面表示，对此片“我们不能理解”。

◇ 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

根据江青的要求，1973年12月26日，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电影《中国》联合调查组，负责人分别是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从这个规格就可以看出，事件被置于何等的政治高度。郭玉峰布置任务时说：“中央首长有一个批件，先把片子查清楚。第一，拍片人怎么来的？报告中央没有？协定是什么？超出没有？第二，片子内容问题，叫于会泳看一下，我们也看。第三，上层建筑、阶级斗争问题要抓。”1974年1月10日，郭玉峰又召集调查组说：“弄清问题性质，主要是谁的责任？怎么处理？”还说：“要看尖锐些，是国际意识形态问题。”

周恩来了解到调查组的行动后，感到有必要作些澄清，让办公室向中组部借调来了广播局关于《中国》的拍摄档案，发现自己与杨振宁谈话时要求查查的指示没有被记录在案。于是，他叫秘书摘抄了他与杨振宁谈话的有关部分，并在摘录材料前面写道：“我因不识此人，不知此事，故告当时参加谈话者查查，记录非熟手，未记人。供中组部查核此事时参考。”但是，调查组把周恩来的批件搁置一边，仍然继续追查。调查组在找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谈话时，直接问：安东尼奥尼的摄制组来华，外交部上边是谁批准的？彭华回答：由外交部批准。他们又进一步追问：外交部有那么大的权力吗？有这种规定吗？彭华不语。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个字的责任推卸，就可能给周恩来带来麻烦。尽管没有找到根据，但是，在当时的巨大政治压力下，调查组仍然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吻处理此事。1974年1月23日，调查组研究给中央的报告初稿。吴德套用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的批评，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外交路线取得很大胜利，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联合时易右，决裂时易左。”“前段转尼克松来这个弯，现又出来右倾投降主义。”郭玉峰接着说，“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右，当前各方面都有”。

1月30日，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报告说：“遵照江青、姚文元对XX同志来信的批示”，调查组先后在北京、林县、苏州向有关人员作了了解，查阅了档案资料。报告指出：“这部影片，是1972年5月由帝国主义分子、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是一部反华反共的影片。”“对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丧权辱国、反华反共的重大问题，竟然放弃原则，丧失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报告分析说：主要问题有三方面：一、外交部对意摄制组来华丧失警惕，不加审查。二、在接待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三、反动影片拍完后，外交部新闻司、广播局不审查，又不报告中央。报告下结论说：“所以犯这样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是丧失阶级警惕性，是不抓路线、不抓大事的必然结果。”这句话的矛头所指，是很明显的。1973年7月，毛泽东曾经批评周恩来和他分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12月，毛泽东又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分管的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整个报告，有6处提出外交工作的“右倾投降主义”，最后提出4条建议：

- 一、广泛发动群众，彻底批判这部电影，组织力量撰写文章，对帝国主义反华行径，予以坚决回击。
- 二、通过外交途径向意政府和意广播公司提出抗议，要他们立即停止放映这部坏片；对买此片的国家，要进行交涉，要他们不要放映；在已经放映的国家和地区，要组织国外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对影片批判，肃清影响。
- 三、今后来华拍片，要严格控制 and 审查，拍片后必须经我审查，才准放映。
- 四、犯错误人员要作出深刻检查，要作出组织处理，并报告中央。

根据这一报告，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和和其他外交官员毕显声、许家现、李玉成被调回国，给他们办学习班进行批判。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被点名批判，多次作出检查。

在调查组作出结论向中央报告的同时，江青等人已经展开了一场口诛笔伐的批判运动。

◇ 对电影《中国》和安东尼奥尼的批判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撰写的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文章指出：“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文章描述了电影“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像样子”的例子：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

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洲人的自傲”的架子，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

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像，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文章最后说：“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污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此后，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一直持续到1975年年中。仅1974年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出版，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

今天看来，安东尼奥尼镜头里反映的中国，是基本符合“文革”时期社会实际情况的。但是，同样的镜头，在观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下，引起的联想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除了有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在起作用。何况，还有江青等人的欲加之罪。所以，安东尼奥尼起初面对批判浪潮，虽然不理解，但还能容忍。他通过意大利通讯社安莎社发表了一则声明：“如果说这是对我的影片、我的工作、对影片所反映的那么不同的世界所作出的理解力的批判，那不管这种批判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会受宠若惊，这就是说，一个艰难的工作得到争辩和讨论，这对作者总是有益的。”

他也朦胧地感到了中国人内部有极左和温和的两种斗争，说：“相反，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因为这次拍摄活动是中、意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来拍的，中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意大利政府的不安。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原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但消息传出之后，由于受到各方压力，最后改在另外一家影院放映。出乎意料的是，正要进入影院的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抗议的左翼观众包围了，他在自己的国家也被指责“背叛了中国”。但是，当“四人帮”控制报纸称呼安东尼奥尼为“小丑”，并以他参加过军队，将他称为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时，他忍无可忍了。在1975年2月18日英国《卫报》采访中，安东尼奥尼愤怒地说：“我不明白他们

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言语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污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字。”

◇ 重新认识《中国》

时光飞逝。粉碎“四人帮”后，在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有关部门又谈到了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说：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

根据这一指示，1979年1月25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74年“四人帮”借题发挥，捏造罪名，无限上纲，别有用心地大搞所谓“批判”，在“一·二五”大会上公然叫嚷《中国》是汉奸加间谍搞的，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其险恶用心主要是打击、诬陷敬爱的周总理，干扰、破坏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同时借机诬害、打击干部和群众、“四人帮”制造的这一事件影响极坏，流毒很深，对外进行过多的交涉，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

报告建议：一、应彻底揭穿“四人帮”利用这部影片反对周总理的阴谋，批判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进一步拨乱反正，肃清流毒。二、在中央和各地有关部门，在过去所谓“批判”这部影片问题上，有冤案、错案的，应予彻底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一场持续几年的政治风波到此，似乎可以画上句号，但是，事情对安东尼奥尼来说，还远没有结束。他执著地等待着他的这部影片能够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能够重新认识《中国》。1983年，安东尼奥尼患中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2004年9月，在他的回顾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的前夕，一位中国记者采访了他，最后问他：“您想回中国吗？”20年间几乎丧失说话能力的92岁老人吐出了：“ANDIAMO, SUBITO!（我们一起走，赶快！）”记者、夫人、助手，在座的人无不泪流满面。

□ 摘自《党史博览》2006年06期

~~~~~

#### 【文献资料】

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  
——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 人民日报评论员 •

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抱有不同的态度。亿万革命人民和广大国际朋友表示赞扬和同情，而一小撮反动势力则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一种现象。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

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 （一）

影片摄制者在解说词中说，他“不打算评论中国，而只想开始观察中国的各种面目、姿态和习惯”。这完全是骗人的。这个所谓“纪录片”，每一个镜头都有评论，这是借用反动艺术手法污蔑和丑化中国的极其恶毒的政治评论，是肆无忌惮地公开露骨地反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评论。影片的镜头从北京天安门开始，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其实，这种安排却是为整个“纪录片”的反动主题服务的。影片说，“北京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中心”，“人民共和国就在天安门宣告成立”，“文化革命的红卫兵浪潮也在这里兴起”。然后，影片“离开天安门”，带领观众开始“观察”中国，也就是要人们看看中国革命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接着就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象样子。影片的这种结构和布局，纯粹是为了把攻击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咒骂革命，否定革命，反对革命，就是这部影片的要害所在。

反动影片《中国》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安东尼奥尼把上海作为“工业化的大城市”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大肆炫耀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功劳”，竭力贬低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伟大成就吗？影片中还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拍了一些丑化劳动人民的镜头。作者的险恶用心是要暗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岂不可想而知！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安东尼奥尼还恶狠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

这部影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诋毁和污蔑是多方面的。从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从文化教育到体育运动，从医疗卫生到计划生育，以至幼儿园，统统不放过。

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化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子“今天成了办公楼”。

影片竭力否认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说什么“北京人是贫穷的，但并不悲惨”。承蒙这位导演先生手下留情，还说我们不算悲惨；但他的真意是嘲笑我们“贫穷”。他不是在城市和乡村拚命捕捉一些镜头，攻击人们“衣服破旧”，“劳动繁重”，诬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遇到“穷人”吗？所有这些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老爷的腔调！

安东尼奥尼所以把解放后的中国描绘成这样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非是要人们得出中国不应当进行革命的反动结论。他攻击人民公社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已剩下“寥寥无几”，甚至借用打太极拳的镜头，造谣说“新的领导人”要“取消”这一“古老的传统”。总之，在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动分子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中国的革命搞糟了，只有倒退，只有复旧，才有出路。这就充分暴露了挂着“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 （二）

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他企图通过影片制造这样的假象，似乎中国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地位，没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解放，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没有热情的。

全世界都看到，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在我们的国家，“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是，安东尼奥尼却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好吃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洲人的自傲”的架子，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

更刻毒的是，安东尼奥尼还用拐弯抹角的语言、含沙射影的手法来向观众暗示，中国人民的精神是受压抑的，心情是不舒畅的，对现实是不满的。他在上海城隍庙茶楼的画面中插入了一句不怀好意的旁白：“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忠于现在”不过是一句反话，实际上是要诬蔑中国人民对新社会的拥护是出于被迫的，并非真心实意。安东尼奥尼不是在影片中一再渲染中国人民是不自由的吗？他公然嘲讽工人讨论会的发言“重复而单调”，“不是一个真正的讨论会”，诬蔑中国儿童高唱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治性”歌曲同他们的天真可爱不相容，因而并非发自内心。他还胡说由于人们的“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是有着不满现实的莫大“痛苦”的，只是不敢表达出来而已。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局面生动活泼，广大人民享受着真正的民主，心情无比舒畅。安东尼奥尼企图钻空子，煽动中国人民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只能是枉费心机。感到“痛苦”的则是一小撮妄想在中国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至于说什么中国人民“想念过去”，这更是污蔑。什么人“想念过去”？中国人民对百年魔怪舞翩跹的“过去”，是深恶痛绝

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才念念不忘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朝朝夕夕梦想使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拉不回来的，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辗得粉碎！

### （三）

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所采用的手法，也是极端反动和卑劣的。

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程，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而他认为可以用来污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则又是全景，又是特写，不厌其冗长。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象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在影片的剪接上，画面跳来跳去，好像是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片段的衔接，都是恶意安排的。比如，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象，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影片在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很坏的。影片的大部分都以灰暗的光线和阴冷的色调拍摄。黄浦江象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村阴影重重。总之，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尤其恶劣的是，影片摄制者还利用配乐作为进行诽谤的手段。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据有关单位揭露，这种剪接完完全全是伪造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真是恶毒透顶！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这从他在中国的拍摄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在解说词中公开宣扬有很多镜头是象间谍那样偷拍的。他得意地说，他在黄浦江如何“冲破禁令偷偷地拍摄了”中国军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如何“把摄影机掩盖住”，“冷不防地抢摄这里的生活场面”。他还埋怨说“带着摄影机在前门大街那里行走是不方便的”。什么不方便？就是做贼不方便。更有甚者，他为了炮制污辱中国人民的镜头，在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竟然要别人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让他拍摄；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要群众按照他的口味改换服装，否则拒绝拍摄。他的这种偷拍、强摄、作假的行径，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尊重和藐视。

### （四）

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它的国际背景的。

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是国际上反华的急先锋和总后台。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人民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他们说，中国人穷得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新的破坏”；中国人民“疲困不堪”，处在“严重的苦难”之中，过着“兵营式的生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愚蠢的诽谤，只是暴露了苏修叛徒们的丑恶面目，而没有使他们捞到任何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苏修的反华谎言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奥尼的反动影片披着“客观”、“真实”的外衣来欺世惑众，又把苏修这一套造谣诬蔑搬出来，妄图起苏修反华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安东尼奥尼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已经破产的苏修反华宣传的应声虫。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出笼之后，美国广播公司花了二十五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并在美国公开放映，还有人帮腔说这部反动影片是“吸引人的”。看来，杜勒斯的阴魂仍然在一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身上，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出现，也适应了这些反动势力的需要。

安东尼奥尼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他决不能代表千百万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态度的意大利人民。反华，这是广大意大利人民决不会同意的。安东尼奥尼拍摄这样的反华影片，同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民要求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显然完全背道而驰。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互相了解。在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我们从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一再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从不隐讳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前进中的缺点，还有落后、反动的东西，需要继续革命。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欢迎各国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但是，谁要是冒充“朋友”而实际上却干着卑鄙的反华勾当，去博取极端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喝采，我们就要给予彻底揭露，以剥夺其招摇撞骗的资本。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告诉人们，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必须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世界上总有敌视中国人民的势力，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反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华的好汉，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管使用什么武器，玩弄什么手法，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 原载《人民日报》1974年1月30日

~~~~~

【动乱年代】

不应遗忘的六六至六七年之间的反孔运动
——文革反孔运动面面观（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支由大约200名的红卫兵组成的长征队伍从北京被派往山东省曲阜孔子的家乡。在这里他们亵渎和捣毁了大量与孔子有关的历史墓碑，文物和建筑。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孔运动。尽管这个事件对全面了解整个文化革命有明显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文革的学者以及专业文献中多年来对此一直忽略。几乎所有对文革期间的反孔活动研究都集中在1973—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然而，如果要完全理解整个文革的复杂性，对1966年底及1967年间第一期反孔运动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进行了解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旨在对此次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描绘、审视和分析。

与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大量历史档和学术研究形成明显的对照是，大多数对文革研究的最流行的主要学术著作对1966年和1967年的第一期反孔运动论述甚少。比如在严家其的综合性陈述文革期间的《文革十年史》中，〔2〕提及这场运动的只有一句话。费正清在他的China: A New History一书中甚至连一点都没有提到第一次或第二次反孔运动。〔3〕而最近几年出的中文版的较具综合性的文革文献中，比如杨建利主编的《红色革命和黑色造反》〔4〕以及中共党史出版社在2000出版的《回首“文革”》〔5〕对这场运动在也没提及。

然而，随着国内学术界近年来逐渐的放开，对此运动以及对毛泽东“孔子情结”的评论也逐渐在部份国内刊物上出现。例如《历史的审判》（历史的审判编辑人员，2000）一书简单地描绘了红卫摧毁孔子墓碑的历史史实。在《为毛泽东辩护》一书中，作者也分析了毛的孔子情结。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出版的有关第一期反孔运动的原始历史文档。其中主要的有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革命文库》〔6〕和收集到《新编红卫兵资料》中的《讨孔战报》。〔7〕这些最新发表的与1966—67反孔运动有关的历史文献将作为本文的基本来源。

◇ 在孔子家乡的骚乱和摧残

为了更好地理解在1966秋和1967年冬发生这场劫难，有必要对1966—67年反孔运动提供一种按时间顺序的陈述。当此运动开始时，中国已陷入全面动乱。在1966年八月和九月，受到毛及中央文革组的鼓励和响应“破四旧”及“造反有理”的号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忙于任意毁掉任何他们认为与四旧有关的一切东西。离北京成百上千里路远的孔子家乡曲阜似乎也是在劫难逃。砸三孔（孔庙、孔府和孔林）在1966年8月开始拉开了序幕。当时有些曲阜当地的学生自发地响应全国范围内的破四旧运动并试图毁掉他们家乡的孔子遗迹。然而，他们的努力遇到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抵制。当地红卫兵外出北京和济南寻求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支持但未能如愿。

对曲阜三孔的全面冲击要追溯到1966年的11月7日，当时大约200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队”的大学生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并宣誓要捣毁“孔家店”。在集会上谭厚兰（北京红卫兵五位主要领导人之一），表示“孔家店”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是“吃人的阎王殿”，“封建主义的象征”、“四旧势力的代表力量”、“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支柱”、“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以及“把毛泽东思想树为绝对权威的大障碍”。因此，他们将前往孔家店——“反动势力的老巢”去闹革命。在11月9日，这些北京学生到达孔子家乡曲阜。在11月10日他们出版了第一期《讨孔战报》，其标题是：“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在同一刊物上，他们的檄文是“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此文章除了重申了一些陈辞滥调外，还开始批判一些孔子学说和儒教理念，如“畏天知命”、“反动的礼教”，以及“服服帖帖甘受奴役”，他们谴责“孔家店”是“大黑店”，等等。他们还攻击孔子轻视妇女、瞧不起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他们进一步抨击孔子的

“中庸之道”，批判他提倡的“仁爱”以及他认为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他们也试图证明孔子思想是所有邪恶之源。

11月10日，一些北京红卫兵试图进入孔府，向当地保护孔府的地方干部挑战，并寻找隐藏在孔府内的“犯罪证据”。红卫兵的企图最初被当地官员以需要保护重要文化遗产为理由阻止了。然而，通过“激烈的斗争”，红卫兵们最后设法进入了大院，并看到了许多孔府内的东西。在这许多“犯罪证据”中，红卫兵找到了国民党党旗，蒋介石的图像和他的训导词、旧通货币、旧的封建书籍和图画、甚至“特务工具”……。

11月11日，北京红卫兵着手排除毁灭曲阜孔家历史遗迹的技术障碍，即：国务院1961年的决定，该决定中指明了孔庙、孔府和孔林为受政府保护的文化遗产。红卫兵们先是向国务院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他们要求政府取消“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孔庙、孔府和孔林。他们谴责国务院保护“牛鬼蛇神”和孔子，要求国务院马上满足他们的要求，并“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这种“革命行为”包括在孔府内自由书写毛的语录，挂毛的像以及随意破坏孔府内的“反革命赃物”。

11月15日，也就是他们发出抗议信后的第四天，红卫兵们又改变了战术：从“文斗”——写信发展到了“武斗”——施加暴力。那天，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曲阜师范学院和国内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以及许多当地居民在孔府前举行了一场要“彻底打倒孔子”的誓师大会。他们谴责政府官员利用石匾上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牛鬼蛇神”。集会完毕后，气愤和激动的人群冲向孔府前的碑匾，大喊“砸了它”，重1,000斤的匾马上被红卫兵拖倒，然后用锤子砸了个粉碎。他们然后去找周公庙，把其石匾同样砸了。有些红卫兵甚至进入孔庙，他们损坏和毁掉了更多的物品。捣毁行为持续6到7个小时后，红卫兵又进入孔林，他们毁掉保护匾及两只石狮。这天结束时他们还毁掉了至圣林牌楼。搬掉这些官方的保护匾并为下一轮暴力埋下了伏笔。

11月20日，在曲阜的北京红卫兵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中提出了“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十点建议”。这封电报除了重复了一些旧的反孔言辞外，还宣布在11月底，红卫兵将举行群众大会，“彻底打倒孔家店、破四旧”，把“反动学术权威”与一座孔子泥像一起游街示众，或烧孔像，刨平孔坟，捣毁各种神庙内的偶像。为了造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反孔运动他们还发了致全国公开电进一步要求各地宣传部门宣传他们的资讯。此电报甚至鼓励红卫兵和全国各地“革命的教师和学生”参加步行的大串连，参加工农兵的讨孔活动。最后，电报提议建立全国联络委员会“团结国内所有讨孔革命组织”。

从11月28日到11月29日，数十万以上的红卫兵、工人和农民在曲阜师范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持续两天的集会，誓要“彻底捣毁孔家店”。许多人一大早开始出发，一些来自邻近地区的红卫兵甚至走了一通宵来到集会点。早上六点时，红卫兵和农民开始在集合处汇集在一起，“来自各个方面的红色象融化了的铁一样”，人们挥动着造反旗帜，手拿毛的语录，把曲阜师范学院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在集会期间，他们一个接一个发言来批判所谓的“反动人物的”，他们先批判孔子，再批判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参与者。每次集会后，与会人员就接着去破坏孔家遗迹和文物。他们配备了各种破坏工具，行动时像一股“大的红色波浪”。他们哄涌而入进孔庙、孔府和孔林。在去这些地方的路上，他们让县、区、省和学校官员站在卡车上或站在孔子泥雕旁边“陪斗”。

他们一到达孔林就不断焚烧孔子雕塑、铲平坟墓、挖出棺木、掘出尸体和取出棺木中的金银，并粉碎墓碑等等。在11月29日，参与者向毛泽东发了一份公开电宣誓要效忠毛，批判

孔子和儒家思想，并告知了毛他们对孔府遗迹的破坏战果。

尽管大多数的孔府遗迹在11月28至29日已受到严重损坏或摧毁，但进一步的破坏行为还在持续着。事实上，1967年2月发表的来自“讨孔战报”中的“紧急通告”就表明了曲阜的公民还在孔林内肆意公开挖掘坟墓及陪葬的珠宝以及随意挖孔林中的树木。

根据此通告，有1,000棵以上的松树从孔林中被挖出来。有一家曲阜银行购买了价值十壹万壹仟元人民币的黄金。这些卖主所卖的黄金就是从孔墓中获得的“战利品”。一些掠夺者甚至建议“分掉整个孔林”，而盗墓人还吹嘘“一晚一拖拉机”，其意思是：一个晚上掠夺的物品价值一辆拖拉机的价值。这在六十年代意味着一笔天文数字的钱。掠夺者之间甚至经常爆发暴力冲突，这种掠夺行为也波及到曲阜的其他地方。

伴随着对孔府遗迹物质上的摧毁的是对孔子理论上的批判和讨伐。此种批判来自这次运动的官方喉舌——《讨孔战报》，这是第一份也许也是唯一一份以反孔为办报宗旨的唯一的报纸。这份由“彻底捣毁孔家店建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红卫兵报设在曲阜师范学院。此站由赋有同一使命的七个红卫兵组织构成。

这份报纸从创刊到在1967年3月前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免费赠送。它的重要作用是把反孔活动的资讯传播到全国各地，它还为其他地方起了示范作用。

在1966年11月底砸“三孔”后，此份报纸继续批孔。它在理论上探讨儒家学说并由曲阜地区农民和工人对“孔子的批判”，“揭露孔府内罪恶”，诋毁“1962年的孔子讨论会”。它也谴责刘少奇对孔子思想的认可以及所谓的山东党内的走资派。此报也报导了1967年初在曲阜举行的“孔子罪恶展览馆”。“讨孔战报”成为了此项运动的喉舌。1967年8月底官方停止了它的发行。当时编辑们引用的停刊理由是：“它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学生需要重返学校参加革命”。

应当注意到在这同一时期毁掉孔子石碑的行为不只是局限在曲阜。在上面提到的“彻底摧毁孔家店的十项建议中”，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批孔，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孔运动。这些建议通过在全国发行的“反孔宣言”到达了全国各个角落。

他们的建议随同他们大量毁掉孔子石碑的行为，激起了全国疯狂毁坏孔子遗迹的热潮。在南京，红卫兵把“文庙街”改成“人民街”。《纽约时报》有一篇名为“25个世纪后红卫兵们辱骂的孔子”上这么写道：红卫兵最近几周在广东附近内陆城市的街上冲刺，拖拉着大师（孔子）画像，画像上标有“我是牛鬼蛇神”……。游客们报告说：红卫兵作为文化革命的急先锋，一直在谩骂和焚烧孔子作品，他们说这些是封建思想头号罪犯。甚至在甘肃东北省兰州这一遥远的城市也发生了此类事。在那里，孔子氏族一整套少有的几本家谱，共含有108卷，被兰州一以大学为基地的红卫兵组织烧掉了。

反孔运动后果简直无法描述。只在曲阜，大约6000件文化遗物被毁掉；大约2700卷古代书籍、900件以上的书法和图画珍品，以及大约1000块来自各个朝代的石碑均被烧的烧砸的砸了。在这些毁掉的物品中，有70件被划为国家最具价值的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有1000本以上被毁的书籍为“孤本”。孔子出生地，这一具有中国集体文化遗产的出生地，遭受了毁灭性的和永久性的破坏。这些文化遗产曾在秦始皇手中幸存下来；也曾毁灭性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幸存了下来；又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幸存了下来；还在日本侵略者手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它在文化革命的蹂躏中没有幸存下来。曲阜再也不会是原样了。

◇ 后台教唆者们

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动乱自然向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人们可能想知道红卫兵这么做是否出于它们自己的意愿或是出于某些幕后操纵人的策划。尽管在文革期间许多自发的“革命行动”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8月25日曲阜当地红卫兵企图要毁掉孔碑的意图），我们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即文革期间的许多混乱实际上是“受控的无政府状态”。

在许多情况下，文革中发生的暴力和混乱是有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默许，认可，甚至指使为前提或背景的；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运动”就是一例。反之，如果毛认为混乱对他的政治议程和权力斗争是有害的，他会毫不犹豫地制止它的，他在1967和1968年使用军队制止全国范围内的派性武斗以便控制局面即为一例。由北京组织的长征红卫兵队进行的反孔活动和在曲阜进行的大面积破坏似乎不是即兴决定和自发行为。如果把“破四旧运动”与曲阜发生的事相比，人们可能会认为曲阜的毁灭性行为就是“破四旧运动”的一部分。毕竟在他们眼中，孔子是一位对中国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执牛耳者。

然而对这两次运动仔细观察一番，就会看到在许多方面不同点。第一，两次运动的时间不同。“破四旧运动”大部分爆发在1966年的8月和9月，但在10月是高峰。1966—67的反孔运动始于1966年11月。在那时毛已把他的注意力放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这次运动的目标是毛的党内敌手——刘少奇和邓小平，而不是所谓的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第二，两次运动的参与者都不同。“破四旧运动”期间的大部分暴力是由中学红卫兵干的，在北京也叫做“老红卫兵”。但后来的这个“红卫兵讨孔远征队”是由叫做“造反派红卫兵”的大学生组成的。他们由谭厚兰领导，这位学生领袖是毛和他的圈内人攻击政治对手的重要“枪手”。在毁掉曲阜石碑时，“老红卫兵”已经失宠于毛，毛把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视为清洗目标。第三，两次运动所运作方式不同。“破四旧运动”主要是一种任意的想怎么毁就怎么毁的暴力。相比之下，这些来自北京的大学的红卫兵显示了高度纪律性和周密的计划性。在11月7日，他们在北京宣誓集会，在11月9日到达曲阜前，他们对即将进行的破坏活动提前两周通知，并花了时间来寻求支持。在11月28至29日的毁灭行动开始前，他们还联络和组织了当地学生和居民。他们的操作持续到1967年8月。这些事情没有一件类似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的高潮时所做的那样。相反，在曲阜的反孔活动是计画周全管理得好的一次运作。

最后，两次运动发出的资讯不同。“破四旧运动”的特点是动手毁掉“四旧”，迫害甚至杀害黑七类份子，但红卫兵的破坏行为限制在中央文革小组规定的破四旧的范围。然而，在1966—67年反孔运动前后十个月期间内，一些重大的政治资讯不断传来。反孔运动的支持者鼓吹并进行对儒教的理论批判，他们积极地批判资反路线，攻击刘少奇和当地官员并批评1962年孔子讨论会及参加者。简而言之，1966—1967的反孔运动迹象表明，这是一个特地安排的政治运动，它同毛计画的文化革命进展一致，而不只是随意的暴力行为。

在曲阜的北京红卫兵的行动表面上也与大串连发生的事相似。然而，仔细了解事实就会看出其他情况来。在大串连期间，许多来自北京的激进学生走到全国各地并激励当地红卫兵和造反分子起来反对当局并毁掉文化遗产，古董以及历史遗迹。所有这些事件似乎与在曲阜的北京红卫兵所干的事相似。然而，大串连起于1966年8月末，在1966年10月末中央文革组发出中央文件禁止坐火车进行大串连时就已经渐近尾声。但北京红卫兵却在11月初才坐火车到了曲阜，到1966年11月末才开始大规模砸孔碑。

在曲阜的反孔活动不仅与“破四旧”和大串连运动无关，而且所有的事实都是幕后主持者的杰作，他们插手一切，特地安排、鼓励和颂扬曲阜所发生的一切。戚本禹所扮演的角色就很说明问题。。戚是中央文革成员，负责文化事务。他反复向红卫兵传达毛和文革领导成员的指示，

讲那些毛和其圈内人想要排除和清洗的许多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例如：刘少奇、邓小平和彭德怀。比如在1967年3月，戚把江青的话传达给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要她攻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样谭厚兰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井冈山战斗队”的大约200人也是通过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造反派头头林杰煽动和指使而去曲阜的。

除了戚本禹和林杰之外，他们的上司陈伯达也参与策划了这场1966—1967的反孔运动。陈当时是文革小组的组长并且是毛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1966年12月1日，即曲阜孔林大量被毁后第二天，戚本禹就在北京故宫发表了讲话。他向听众们描绘了两天前在曲阜发生的事情——这也证明他对那里最新进展的密切了解和关注，他对红卫兵在曲阜的所做所为进行了赞扬并认为造反有理。在他得知曲阜红卫兵想挖掘孔子坟墓时他就进一步提出了建议，他特地请示陈伯达问红卫兵是否可以进一步这么做。以上这些在戚的下列讲话中就可体现出来：“小将们……想要去掘孔墓。我请示了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说他们可把它挖出来……。他进一步指示孔庙应当变成展厅来教育人民知道阶级斗争。”

很清楚，红卫兵寻求并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允许在曲阜进行毁灭性的活动。后来他们甚至执行陈伯达的指示把孔府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教育大厅，他们树起“孔府罪恶展览”的牌子。此展览对外开放，“讨孔战报”分别发表了四篇文章描绘和赞美了这次阶级斗争教育的展览。

现在大家清楚知道戚不仅幕后指使红卫兵去曲阜制造一场浩劫，而且他也密切监视红卫兵到曲阜后的活动。显而易见戚起了信使的作用，但他不是最后的决策人。事实上，在1983年对戚审判时，戚还争执道：“文革中我的活动没有一件是我弄出来的。我是按照康生、江青和陈伯达的指示安排了这一切。”

戚的辩解可以被认为只是为了回避他的个人责任，但以上他在故宫所说的言辞似乎更支持了他在文革中仅起次要作用的论点。当时真正的权威似乎掌握在他的顶头上司陈伯达手中，因为陈对曲阜的事件是完全了解的，并能够决定在那里什么该发生或什么不该发生。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激进的红卫兵破坏历史文物，事实上却是毛和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所有这些都从文革后1983年中国政府审判戚本禹时的情况得到部份证实。当时戚被宣判有罪，判处十八年监禁。根据裁决，他的部分罪行是指示谭厚兰和红卫兵毁掉曲阜孔子家乡的文物。

然而，作为文革小组的成员，早在1968年戚本人也受到了毛的清洗，戚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代人受过了，正像“四人帮”的许多犯罪事实实际上代毛受过一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文革期间的高度控制的政治气氛，这场重大且徐徐进行的反孔运动进行得这么长久而不为毛所知、也不为毛所批准是非常不可能的事。研究表明毛在文革期间的反孔活动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根据姚文元所说，毛当时告诉1966年12月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代表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除孔子在人们生活中各方面的影响。”毛讲话后很快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支持红卫兵在曲阜所干的一切并反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即文化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根除孔子的影响。考虑到毛的批孔言论是在曲阜受到大规模破坏之后不久发表的，以及毛在中国实质上的皇帝的地位，人们就不难推测谁会是其后的主要的教唆者。事实上，可以说没有毛就不会有1966—1967年的反孔运动。

◇ 毛和反孔运动

似乎有两个重要因素可帮助解释毛的反孔立场和行动，即：毛反孔的复杂性及他反复使用反孔作为肃清政治对立面和取得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

除了显然可见的孔子的学说与毛所赞同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在思想上的冲突外，冲突还至少表现为：“博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庸”对“暴力革命”。毛自己的政治哲学已与孔子的学说相违背，他的政治生涯和生活经验更形成了他对孔子的学说的敌对。

毛出身和成长在孔子价值观的社会里，他经常从一种实用的角度引用孔子的话和作品，甚至他给他两个女儿取的名字“讷（犹豫）”和“敏（锐利）”都来自孔子的语录：“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除此之外，毛还有许多理由不喜欢和不相信孔子和儒家学说，这主要是由于孔子的学说和毛思想之间、以及与毛认为已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存有不可调和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武力对协调原则，极端对中庸之道，强调教育对轻视教育和知识份子。换句话说，孔子的学说作为许多思想和学派的思想基础，它与毛的哲学和实践是不可比拟的。

毛的反孔立场在1949年他逐步取得地位后被大大地加强了，这种在中国历史上独尊于天下地位使他超出了最受欢迎或最有权力的皇帝所拥有的。

毛不像他之前的中国皇帝。以前的皇帝极个别除外，他们都紧抱孔孟之道，把它当成国家的宗教，并用它来和支持其统治，而毛在他的许多同志的帮助下，成功地建立了毛泽东思想，并特别在文革期间把它作为中国的新的宗教。这样，他必须要摧毁旧宗教的统治地位。

有一段时间被他指定的继承人林彪还宣称他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远远超过马、恩、列、斯的当代“马列主义”的最高峰。作为国家和国家宗教的最高统帅，毛不仅不需要孔孟之道来支援他的统治和证明他的合法性，而且他有各种理由来用毛泽东思想清除儒家学说，因为它统治了中国人民的心灵并与毛泽东思想竞争。而中国人对孔子崇敬之深，可谓深入人心。仅就这一点，毛在1949年一掌权后就加强了反孔言论和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就一点也不意外了。因为不少有名的学者如梁漱明，就坚持孔孟之道而反对毛泽东思想。难怪中央文革嘱咐北京红卫兵去曲阜“打倒孔家店并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确实毛的著名语录提供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基础，并且为他的政治思想总结出了一个关键的一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种暴动，一种暴力行动，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暴力行动。”这些思想和孔孟之道精髓的一部分的讲究、悠闲等等的的生活质量是完全相对立的。

毛不难找到反孔的理由，在此也没必要去追溯毛反孔的思想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毛巧妙地使用孔子作为其权力斗争的有效工具。毛成功地把反孔与党内的权力斗争结合起来。他首先把孔孟之道变成万恶之源，例如先前所提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支柱”。他还收集完全是断章取义的他对手写的文章里的孔子语录，把他的对手们与“罪恶的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最后，他根据对手们与孔孟之道思想上的联系来进行政治上的清洗。

这一方式运作起来就像是毛的一道神奇的咒符，可以到处贴到他的政治对手头上。尽管大部分毛清洗的同志是共产党员，然而毛成功地把他们标榜为“孔子的崇拜者”，并毫不犹豫地清洗了他们。在毛的统治下，几乎毛认为的每一个敌人都成为了孔子的崇拜者，他们中包括共产党内的毛的老同志，如王明、刘少奇、林彪和陈伯达以及和他缠斗了一生的国民党的敌手蒋介石，还有在苏联和日本的“有敌意的反革命外国人”。根据以上的事实和分析，似乎看来在1966—1967年曲阜的反孔活动仍是毛使用反孔道的一个例子来怀疑和清洗他的对手，并且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执行那个计画上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1966—1967年的反孔运动是按计划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绝不是简单的“破四旧”或是一场自发的反偶像崇拜的群众运动。相反，它是一场毛亲自所领导和策划的文化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要保证毛的思想的绝对权威，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中怀疑和清

除掉毛已察觉到的对手。北京和曲阜的红卫兵被利用成为了一种工具，来有助于达到目的。国家资助的群众性的故意破坏文化以及在曲阜的暴力导致的结果是毁了孔林、亵渎了2000年来中国哲学主流的诞生地。这毫无疑问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造成了中国人民感情的和心理上的创伤。然而这些责备和犯罪应归属毛和他的助手们，因为是他们利用反孔来清洗毛的对手和敌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毛的助手们最后也受到了毛的清洗，例如戚本禹、陈伯达和谭厚兰。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被打成了“孔老二的信徒”，如陈伯达。罪责还是可进一步归到11月28—29日毁坏孔林期间100,000多强有力的在曲阜参与暴力的老百姓，这些人成了毛政权在毁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集体财产时的忠实工具。

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比起1966年至1967年间的反孔运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两次运动尽管有明显相似之处，但是也有明显的各自的特点。例如，许多反孔标语和口号在第一次反孔运动期间就冒出来了，他们也广泛地用于第二次运动，例如：攻击孔子鼓吹人道观和仁爱运动。两次运动都由毛和他的亲信们发动，两次运动都是毛利用反孔来攻击并扫除政治对手的例子。在许多方面，1966—67年的反孔运动有助于铺平了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之路。在另一方面，这两次运动在许多方法上非常不同。第一次运动造成了更多物体的灾害，而第二次运动则更广发深入，并涉及到了讨论和中国的第一任皇帝—秦始皇。第一场运动对大众来说更容易理解，而第二场运动在全国引起了新的混乱，几乎导致了另一轮全国范围的派别战斗和骚乱。当然毛的政府马上采取行动，终止了这些运动。文革期间的反孔运动的结果是严重的。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例如道德缺陷、精神腐败、金钱至上，笑贫不笑娼等等，这些问题至少部分上可追溯到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破坏，尤其是过去五十年中特别在文革期间，学校的传统道德教育被破坏殆尽了。

然而，儒家学说一直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民的意识里，不可能完全根除。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中他重新开始受人尊敬，甚至政府领导都在提倡传统的儒家“以人为本”的“仁政”。有趣的是：现在他们在参考借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了。人们又一次次地蜂拥而至曲阜去拜见孔大师——“四旧”已经无可阻挡地回来了。中国人在重新提倡温良恭谨让。中国的第一任皇帝又被评价成暴君，暴力革命已成为了一个被批判的辞汇。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极“左”思想已被新的“三个代表”的理论所替代，甚至剥削阶级的成员也被鼓励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中来。成为“小资本家”便可得到千万人的羡慕，而成为贫穷的无产者则被人讥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场噩梦，反孔运动也不只是噩梦中的一部分，早已经鲜为人知……然而，中国人民仍有责任来把1966—67年毁灭性的反孔运动的根源反映出来，努力防止它的再次发生。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不是偶然也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民主政府也是如此，文革期间的反孔运动是一种体制的产物，这种体制缺少一些重要的能防止它发生这类事的因素，即民主体制，法规，权力的检查和平衡，公民的权利等等。离开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五十多年后，又突然要回到孔子和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毫无疑问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注释：

1. 本文初稿为英文。此稿为中国温州经济学院蔡碧霞教授翻译为中文
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3. Fairbank, John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Yang, Jian-li ed. Red Revolution and Black Rebellion. Pleasant Hill, CA: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1997。
5.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革命文库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7. Song, Yongyi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Volume 29 《讨孔战报》，1966—196
7。Reprint,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